

关于中国教育管理的一些问题

REFLEC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任之恭

我在最近十三年内在中國參觀了許多大學，和大學里的許多負責人及教授們談到大學里的管理情形，這種情形在全國大學里似乎有千篇一律的現象。大家異口同聲地說，中國每一大學自成一個社會，結果是一個大學在本校的範圍內辦一個單獨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居住着學生與教職工，他們的各色各樣的事情，包括“生、老、病、死、苦、教”等，都需要大學管，同時大學的管理人也無法脫逃這種“義不容辭”的責任。

這種“學校辦社會”的“承包”制，使大學的担子太繁重了。中國經濟水平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小康”地步，以有限的經費對付學校的小社會，要顧到許多方面，就不能充分地顧到學校最重要的目的。毫無疑問，學校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教學。在所管理的事體很繁雜的情況下，為發展教學所需要的預算就會大大地削弱，因此可以說學校辦社會的結果是忽視了辦學的目標。

現在舉出幾個“學校辦社會”的弊病：

(1) 學校領導的負擔太重——學校的領導如校長、幾位副校長、黨委書記、系主任等，都會多多少

少遇到各方面的要求，得分別應付。大多數學校總有一位副校長專門辦理後勤工作。後勤工作人員相當多，有人勤於工作，也有人應付工作。我在某校就遇着一個後勤人員，不大像做什麼事的样子。在國家還沒有掃除“大鍋飯”、“鐵飯碗”的局面下，這些都是常事。但是雇用這麼多效率不高的後勤人員，耗費了學校的經費，實在太不合算了。

(2) 教師沒有辦公室——大學里的教授、講師等是學校的教學骨幹，但我還沒有看到過他們的辦公室（除非有人在實驗室里擺個桌子，算他的臨時辦公室）。他們更不會有電話，也說不上有個秘書，甚至系主任（或和他相當的職位）也不一定沒有辦公室和秘書。在此情形下，難怪許多外國朋友們說，“我們寫給你們國內負責人的信，很少有人回信”。按一般西方人的習慣，他寫了一封信，至少希望對方回信——最低限度有一封“承認收到”的信。這種“不回信”的現象，是我的西方朋友們向我說出的對國內最大的“抱怨”之點。

再說教師們沒有固定的辦公室，他們彼此之間難以在學術或教學上進行研討或交流，學生們有什

麼疑問或其他事，要到教師家里請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這樣學生們很難得到教師的輔導與启发。

還有一點，教師在辦公室辦事，是在大家“辦公”的氣氛中，可專心工作，而在自己家里“辦公”就很不相同了，公私混雜效率可能不會很高。

(3) 教職工宿舍——在西方大學里，教職工很少住在學校宿舍里。他們來學校辦公，到时就回家，他家里的一切與學校無關。當然，西方人大多數有自己的交通工具，這是他們最方便的地方。中國的情形與西方大不相同，須靠公共交通工具來往，非常不方便（就目前情形說），所以中國學校設置教職工宿舍，是實際需要。大學教職工住在學校的宿舍里，自然起源於財產公有制度，無可厚非。但這裡也有些流弊，一時不易改正，譬如教職工分得了宿舍住處，由退休到衰老或死亡，總是占着很難讓出。這裡的難題是，假若不許他住宿舍，讓他到哪裡去呢？但這對於學校就是額外負擔。

(4) 學生宿舍——近年來大學學生愈來愈多，在全國大學中，學生人數由幾千到幾萬，學生宿舍全

任之恭 (C. K. Jen) 美國應用物理研究所 (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 顧問

* 科學院有幾十個研究所集中在北京市的中关村，行政方面和一般大學當然有不同的地方，但是科學院院長也要管理院內大大小小的事情，因此，外面給科學院院長起了個綽號，叫“中关村長”。

部由学校供给。对一位初次看到中国大学的人,他除了看见主楼及其他教学楼外,到处看见的就是一排一排的宿舍,好像摆成一个庞大的龙门阵。给这位游人的印象是一个大学的形状大部分由学生宿舍及教职工宿舍构成。

在西方的大学里,大学肄业生有不少住校的。但有些大学限制,在离学校中心若干公里范围内的学生住校的权利。再者,住校的学生要付给学校住校费(有些学校取费很贵),结果有些学生宁可在校外租房子住(价钱可贵可便宜,依房子的素质与设备及距学校远近而论)。因此,学校为学生设置的宿舍,可以减少。同时西方大学大多是四年

制,暑假与较长的假期,不许学生住校,可以减少取暖(或空调)的费用,大学研究生一概不许住校。

中国有些大学是五年制,学生宿舍的问题又加重许多。中国大学学生大都不要交学费(反观西方大学,学费贵得可怕),住校似乎也不必交费。假如不交学费(听说中国政府有新规定,要学生交些学费),又不交住宿费,那么大学负担便繁重得不可形容。中国或可采用外国大学不许靠近学校的学生住校(尤其是那些家住校内的)的办法,但实际上是否可以行得通,很难说。

(5)职工父母提早退休,让子女补位——听说某些学校有这种情形。假如真有这回事,那在任何原

则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我想这种办法应该废除。

结 语

这篇很短的叙述,是根据本人的见闻而产生的一些感想。中国大学有其一系列的特殊情况,自然无须与国外的大学比较,但在我等常住国外的华裔不免觉得,中国“大学办社会”的现象,有些异常的地方,对大学本身构成很大的负担,已到了限制教学发展的地步。至于这问题如何解决,我希望当政的人或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们想出一些合乎实际的办法,这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会有很大好处的。

(上接第65页)

身发电量的二倍多。以水作冷却媒体,可使附近水域的温度增高数度,而邻近数十平方公里的水域生态将完全遭受破坏。台湾北部核能一、二厂和南部恒春的核三厂,对沿海渔业造成很大的冲击。南湾的珊瑚也因遭受到废热水的伤害而大量死亡。

从安全的角度看,核能电厂营运所冒的风险比其他传统能源设施要高得很多。由于操作人员的疏忽或错误,以及控制设施和安全系统的失常,可以使核能电厂的反应炉发生熔炉现象而导致辐射物质外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1964年WASH-740修正报告中,曾经警告过核能电厂事故灾害的严重性。以200兆瓦的电厂为例,如发生灾害,可能使43,000人立即死亡,10万人受伤害,造成170亿美元的财务损失(1965年币值),辐射污染所波及的面积将有宾夕法尼亚州那么大(11万平方公里)。即使象欧洲及美、日这些具有长久核能发电经验的国家,反应炉意外的事件仍然不断地发生。以美国境内为例,每年反应炉发生的大小意外事故约达3000次。最严重的一次是1979年3月28日宾州三哩岛事件。虽然只损坏了20%的炉心,但五、六年来已耗费了10亿美元,而厂内辐射污染清除和维护的工作尚在进行。匹兹堡大学辐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斯特恩格拉斯(Dr. Ernest Sternglass)曾对该意外事故后辐射外泄对邻近各州婴儿死亡率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发现宾州、纽约州和马里兰州的婴儿死亡率有明显的提高。宾州哈里斯堡儿童甲状腺病例,事故后约增高了10倍。

有人认为核能是最低廉的发电能源。但是这些年来,事实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一座核能电厂的平均寿命为30年,使用完后尚需进行除役(decommissioning)

的工作。日本核能电厂若将除役的经费改为建厂经费的17%(目前为10%),则核能发电成本就高于火力发电成本。核能电厂废厂的除役,其费用很难精确计算,不同大小的电厂亦不成比例,以1000兆瓦压水式反应炉为例,包括埋葬、封存、迁移要费100~180年之久,总费用可与建厂的费用相同。1984年,在美国核能发电的营运成本就已超过燃煤发电,如果再加上早期核能开发研究等成本,利用核裂变原理的核能发电,已逐渐失去它的经济价值。过去几年中,全世界放弃原定建厂计划而取消订单,或放弃建造中的核电厂而改建其他燃煤设施者共达144座。核能工业的开发已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了。

核能工业的发展是整体经济发展的一环,一般长期处于经济劣势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能在短期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往往忽略经济开发对生态的破坏及冲击和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尤其是负责规划经济发展或推行经济开发的单位,为求本单位工作成绩的表现,反而认为保护生态和环境将阻碍经济成长的步伐。但是,我们必须彻底认识到,只靠经济成长给予人民物质上的方便与享受,并不能表示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如果只为表面经济的成长,而不顾生态与环境的保护,一旦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则将耗费更多的财富、资源和人力才能有所补救。我们这一代人为求物质享受所付出的代价,将由我们的子孙后代去偿还。

中国人民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应顾及长远利益,并以稳健、周全的规划和认真负责态度来进行。特别是今后核能工业的发展,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至巨,我们更应该谨慎地先建立核能工业发展的评估制度和严密的管制措施,才不致于重蹈西方国家发展核能工业的错误。